

人格的力量

拿幸福来讲，人是什么比人有什么更有意义。人类的个性特征问题永远是专家、学者研究和探索的重点，无论什么时候，人都带着浓厚的个人色彩。

享受肉体的快乐及精神的快乐都取决于自己。

自得其乐一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会有人说“他享受巴黎”但有人说“他在巴黎享乐”。对于病态的人来说，快乐如同美酒，但都带有胆汁味。人生的不幸并不都是由客观原因造成的，关键在于你对待人生的方式，及你感受的程度。

人格是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它是我们幸福的惟一源泉。而其他的东西只是媒介和手段，不会对幸福产生根本影响。

人们的意识是靠持久和永恒的东西形成的。任何时候人们都或多或少地受个性左右，即使有其他方面的影响，也是偶然的、转瞬即逝的，而且还会受到各种机遇和变故的制约。

亚里士多德曾说：始终不渝的不是财富，而是品格。人们宁愿忍受外来的不幸，却不愿忍受来自

自身的不幸。因为运气是不断变化的，品格却不是那样。源于内心的——高尚的品性、杰出的才智、优雅的气质、开朗的心境和完美健全的体格及健康身体内健全的精神，都是幸福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因素。

最能使人幸福的是愉快而美好的心境。良好的性格会让自己直接受益。快乐惬意的人总有许多理由去快乐，而其他任何东西都难以代替这种性格。

记得一本书里这样说：“你若笑口常开，你便幸福；你若悲哀不已，你便不幸。”

多简洁的格言，一旦快乐敲响了我们的大门，我们就应主动为它敞开，否则，快乐是不会贸然闯入家门的。

我们有理由满足，但我们又惟恐精神的欢乐与严肃的反省或深沉的忧虑相抵触。快乐是一种直接的获取，对于幸福，它就像实实在在的货币，但不像支票。惟有快乐能使我们获得眼前的幸福。幸福，往往处于两个永恒之间的那一瞬。促进这种快乐感并使之得到有效的保障是我们追求幸福的目的。

财富不能给我们带来太大的快乐，而健康却能最大限度地带给我们快乐。我们常常在低等阶层即工人家庭，特别是生活在乡村的人们脸上，看到欢乐和满足；然而在上流社会，却常常会看到充满抑郁烦恼的面孔。

要保持健康就应避免一切过度、狂纵、不愉快的情感及精神上的过度劳累，坚持每天在新鲜空气里锻炼、冷水浴等，从事一些能够促进健康的活动。没有适量的锻炼，就无法保持健康。为了充分发挥身体各个部分的机能，要尽可能多做些运动。

亚里士多德曾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是生命的真正本质。人体的各个部分都在持续不断地运动。心脏，由于复杂的收缩和舒张，才强劲有力而不停地跳动。心脏每搏动 28 次，血液就会穿越动脉、静脉及毛细血管运行一周；肺脏就像一台蒸汽机，在连续不断地呼吸；大小肠在不断地蠕动；各种腺体则在不断地吸收和分泌激素；甚至大脑也随着每一次脉搏的跳动和每一次呼吸进行着双倍的运动。一旦某一部位不能运动了，就会变得像无数被安置在不能活动的场景中的人们一样，外部无法活动，内心又在进行着激烈的骚动，这样就会产生一种眩目的、致命的不平衡。

由于内部运动需要外部运动的配合，我们不得不压抑一些情绪。这里

简洁地表达这样一个法则：物体运动的规律是，速度愈快动得愈厉害。

我们将精神愉快、身体强壮时和因病痛而抑郁沮丧、烦恼苦闷时的外部环境分别与事件对我们的影响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精神却又依赖于健康状况。这并非是客观的“事物是什么”，或“事物自身是什么”，而是因为我们观察事物的方式使我们幸福或不幸。近 90% 的幸福依赖于健康，而所有事物都会由于健康而令人快乐。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能令人愉快，甚至伟大的心灵、快乐的性格，也会由于缺少健康而大为逊色。人们相遇时，首先就是相互问候彼此的健康，表达自己对他人身体健康的关注及良好祝愿。良好的健康状况是幸福的首要条件。最愚蠢的行为，莫过于为了其他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健康。除健康外，无论是什么样的幸福，如利益、晋升、学问或荣誉，都是愚蠢的行为。为了转瞬即逝的肉体快乐而糟蹋自己健康的行为就更不必说了。任何健康的东西都能带来更多的幸福。

健康能在很大程度上给人们带来快乐。但快乐并不完全依赖于健康，一个人在体格上可能十分完美健全，但也许他还会多愁善感、忧郁悲哀，并屈从于一些悲哀的念头。我们确实可以在生理构成上，特别是在一个人感受性和他的体力、肌肉力量的关系中找到这种心情的最后根据。感觉性不正常，就会导致精神失衡，周期性地奔放纵情，就会出现颓丧消沉的心理。天才往往是一些坚强或感觉性敏锐的人。

亚里士多德说：“在哲学、政治学、诗学或艺术方面有着杰出才能的人几乎都是些多愁善感的人。”西塞罗也说：“智者多虑。”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剧中说到人的两种天生的气质：

自然漫长的岁月塑造了一些奇怪的东西，有人拿眼睛窥视打探，就像苏格兰吹笛人的笑声；有人言辞尖刻，但他们笑不露齿——尽管涅斯托尔发誓说滑稽令人捧腹。

让某人感到悲观绝望的事情也许会让其他人感到乐观并充满信心。一般来说，对不愉快印象的感受越强，对快乐印象的感受就越弱。同一件事既可能产生坏的结果，也可能产生好的结果。性格抑郁难处的人，一旦结果不妙便会悲观失望、苦恼忧伤，就算事件是令人快乐的，他也不会快乐的兴致；相反，温和快乐的人既不会为不妙的结果担忧，也不会为此恼怒不安，一旦情况有了好转，他就会为此而高兴。

有的人办事十次有九次成功，但他不会因此感到高兴，他却会对其中一次失败耿耿于怀。相反，有的人即使只有一次成功，也会努力地从经验中找到安慰并保持快乐的心情。几乎没有什么灾祸是完全得不到补偿的，性格忧郁悲观的人所要克服的不幸和苦难，总的说来，多半是虚构出来的，不如那些无忧无虑乐观开朗的人面临的困难和疾苦真实。总是看到事物的黑暗面，常常因害怕坏结果而采取相应行动的人，同总是看到事物的光明面的人一样，也不会经常失望。

神经不正常或消化器官紊乱失调，且天生多愁善感的人，往往会由于长期的不安难受而厌倦人生，导致他产生自杀的念头，甚至某件微不足道而令人不快的琐事也可能令他自杀。当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坏的地步时，他就更可能自杀了。一个人因为长期的不幸而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会冷静坚定地执行自己的决定。受难的人由于平常受到监护，所以他急切地等待着人们疏于防范的时机，然后毫无内心的挣扎，无所畏惧或退缩，以极其自然随便的抗议方式，来实现自己的解脱。甚至最健康的人、最为乐观的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执意去死。如当他的苦难，或对某一不可避免的灾难的恐惧超过他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选择死亡。惟一的区别是导致这种致命行为的必然的苦难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对于快乐的人来说，这种程度要高得多，而抑郁的人，一丁点儿苦难便可导致他自杀。人越是多愁善感，就越容易自杀，走到极端的人甚至没有什么痛苦也会自杀。如果一个人乐观开朗，有健康的身体作为精神支柱，那么，除非遇到灭顶之灾，否则他就不会去自杀。在这两种极端的情况之间，存在着许多程度不同的自杀行为，有的是因为天生的抑郁加剧而自杀，有的是健康乐观者的自杀，但他们都是有实在的理由的。

美被认为是个人的优点，严格地说，它却不能直接给我们带来幸福。美只是间接地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美是在相互引荐时帮助我们生辉的外在标志，使我们在心理上对英俊潇洒的人预先获得某种好感。荷马说，红颜丽质不可轻易丢撒，除上帝外，谁也不能给人以美貌。

只要略加考察就会发现，痛苦和厌倦是幸福的两大劲敌。在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摆脱其中之一，却无法摆脱另一方面。人生在一定程度上游移于这两者之间，原因在于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双重的对立：外在的或客观的与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困境和贫穷使人痛苦，但境况太好又令人厌倦。处

在社会底层的人常常不断地为谋取生活必需品及摆脱痛苦而疲于奔命，上层社会却不断地受到厌倦情绪侵扰。这种内在的或主观的对立源于一个事实，对痛苦的感受和对厌倦的感受成反比，因为感受是直接心灵的力量相关的。就像晦暗麻痹的心灵与迟钝木讷的感觉，以及任何刺激也无法使之受到影响的神经，和对痛苦与忧虑均漠然无知的性格相联系。

从根本上讲，精神麻木，是在脸上反映出来的灵魂空虚，是对外界各种无谓的琐事表现出来的持久而强烈的反映。厌倦根源于为充实心灵和精神而不断地追求刺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乞求一些可耻卑鄙的娱乐，一心想着社交的乐趣，或依仗着一些“长舌妇”或作风懒散的人。由于内心空虚，他们乐于与人交际，追求声色犬马、穷奢极欲的生活，因此有许多人落下了颓废悲惨的下场。再没有什么比摆脱这种凄然悲伤更好的了。精神越富有，就越免于厌倦，而思想的活力却永远也不会枯竭，我们可以在自我和自然的各种现象间找到些新材料，使自我和自然结合成新的联盟，从而不断激励自己。

非凡才智还根源于超常的感受性。意志的力量越大，人的热情就越高，两者结合起来，情感的能力便如虎添翼；不能忍受各种艰难困苦，对障碍的不满情绪就越大。由于想象的力量及在思想范围内所具有的鲜明生动的特性，加上那令人不快的事情，痛苦忧虑的情绪就会被恣意夸大。无论是从主观方面还是从客观方面讲，人越是接近人生某种苦难的根源，他离其他苦难就越远。人有一种尽可能使自己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相一致的天性，所以人都会与自己最容易遭受到的苦难进行殊死的较量。

聪明的人往往把追求自由闲适、避免痛苦和忧伤放在首位，他注重恬静闲适、质朴适度的生活，而避免各种遭遇。在和人们有了交往后，他宁愿过隐士般的生活。如果他很理智，他还可能离群索居。因为一个人自身所固有的东西越丰富，他便越少求别人，同时，别人也很难再给他什么。如果单是从量上相加就能使人聪明的话，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值得的。相反，就算把成千上万的愚人加在一起，也不会使一个人聪明起来。

对另一种犹豫不决的人来说，一旦没有了对日常生活必需品需求的痛苦，他就会不惜一切地努力纵情岁月，与名流周旋，贪恋他的所有欲望。任何离群索居的人，都会依靠自己的一切来谋求快乐，这时他的内在所有也常常会充分展露；而衣衫华丽的愚人却在低劣人格的重压下痛苦地呻

吟。他不能摆脱这种重负，而聪慧的人却会以他那富有生气的思想来摆脱单调乏味的处境。塞涅卡指出：“愚蠢本身就是负担。”这真是千真万确的金玉良言。耶稣说：“愚人活着比死去还要糟糕。”

人们把大脑看做有机体的寄生物，好像它就是寄居在身体里的佣人。一个人充分享受自己意识和人格的时间，就是生存得以休息的产物。生存，是为了操持劳作和奋斗。极度闲暇往往会导致烦恼和沉闷单调。当闲暇被感官的快乐和愚蠢占据时就例外了。从人们度过闲暇的方式可见，有价值的闲暇很少。如阿里奥斯托评价：虚度时光的无知者是多么悲哀啊！凡夫俗子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打发时光，而天才却常想着要如何利用它。

智力不健全的人容易烦恼。原因是他们的智力仅仅是意志的原动力借此发生作用的中介。无论何时，导致意志运动的东西都没有特别之处，意志停滞不动，他们的理解力就会告假歇息。由于与意志同步平行，它需要一些外在的东西才能活动起来。其结果就是人所具有的后天能力都变得停滞迟钝。为了消除这种感觉，人们就会去从事一些琐事以便获得快乐。这些活动与真实自然的运动相比，就像纸币和通货的关系一样，因为它们的价值是随意的——玩牌及诸如此类的把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发明的。如果没有事情干，他们就会玩弄大拇指或敲击桌子，或以雪茄来作为锻炼智力的代用品。

在其他国家，社交场合主要的消遣方式是打牌。打牌是衡量一个人思想是否空虚的标准。因为人们在不想着从事其他事情时打牌，就可以试图赢得别人的钱财。所以可以说打牌为进入大千世界并从事商业活动做好了准备。人们可以借助打牌学会如何巧妙地利用那些偶然而又不可改变的情况，想法从其中获取所能得到的、尽可能多的东西。他必须学会惹人眼目，学会用漂亮的装饰来掩盖商品的低劣。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打牌又是一种道德败坏的行径。它的整个目的就在于用各种诡计和技巧来赢得本来属于别人的东西。在牌桌上的这种习性也会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延续到生活中去。

在商业活动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会把我的和你的财产权利看得和牌戏一样轻巧，一旦不受法权的制约，就会尽可能地利用自己拥有的有利条件。所以说，闲暇是生活之花，或生存之果，闲暇使人回归自我。只有那些自身拥有某些真正东西的人才是幸福的。你会从绝大多数人的闲暇中得

到什么呢？——大概只有些于你无助的伙伴。

没有哪个国家比很少输入商品或根本无须进口的国家生活得更美好，同样，最幸福的人就是精神富有的人，对外在生活条件需求极少或无所需求的人。

人们不应当对外部世界要求过多，一个人能给予别人的东西并不多。歌德的《诗和真》对此有清楚的认识：人们在一切事情上最终都不得不求助于自己。就像哥尔德斯密斯在《旅客》一书中写的那样：无论何地，我们都要把自己托付给自己。自己的运气要靠自己创造和发现。

自我是人们所能获取的美好事物的源泉。越是人们从自身发现快乐的源泉，人们就越幸福。所以，亚里士多德说：“知足者常乐。”因为幸福的其他源泉，在本性上是不可靠、不确定、转瞬即逝和偶然巧合的。就算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也容易耗尽一空，而且也是不可避免的。在老年，爱情、才智、旅行的渴望、马背上的欢乐及社交的能力等这些产生幸福的源泉都会离我们而去，亲戚朋友会被死神从我们身边夺走。这就要要依仗一个人内在的东西，因为只有这些内在的东西才会长久地伴随着他。只有它才是幸福的持久的来源。

世界充满了悲哀和痛苦，没有人能摆脱悲哀和痛苦。命运残酷无情，人类孱弱可怜。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内心富有的人才像圣诞节明亮温暖、充满幸福的房子一样。所以，谁拥有这种杰出而丰富的人格，谁就会获得幸福的命运。

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 19 岁时对笛卡尔有过这样一次议论，当她从一篇文章中得知笛卡尔在荷兰极其孤独地生活了 20 年后，她说：笛卡尔先生是一位最幸福的人，他的处境太令我妒忌了。要像笛卡尔这样，一个人还必须要有足够有利的外部条件，使自己能成为自己生活和幸福的主人，或像《传道书》里所说的：“智慧和遗产是美好的，对活着的人是有用的。”

在天性和命运中已赋予了智慧的人，最关注和渴望的是维护他固有的幸福的基础，为此，他必须能独立自主并享有闲暇，克制自己的欲望，限制自己的娱乐消遣。因为他的愉悦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局限在外部世界。所以，他不会因渴求加官晋爵、牟取钱财、贪恋名声或同伙的赞誉而误入歧途，也不会为满足低俗的欲望和粗鄙的趣味而放纵自己。他会听从贺拉斯

在给乌其纳斯的书笺中所作的劝告：舍弃其内而求诸于外，为荣华富贵而放弃心灵的平静及闲暇和独立，不啻为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即时而赞美牲畜的饱食，时而倾向阿拉伯人的富有悠闲和自然奔放。

人的幸福主要来自内在因素，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一切快乐都以某种活动、某种能力的作用为先决条件，离开了这种活动或作用，就不可能有快乐。他认为，人的幸福在于自由地发挥他的最高能力。斯托包乌斯诠释逍遥派哲学时对这一思想也确切地阐述：幸福意味着在所从事的事情上，行动具有魄力且富于成果。他解释说，他用的“魄力”这个词，是指驾驭一切事物的能力。自然赋予人力量最初的目的是使他有能力和那些全面困扰他的难题进行抗争，抗争一旦停止，那些没有被动用而得到发挥的力量就成为他的负担了。除了依靠这些力量来引起别的痛苦和烦恼的原因外，他使用这些能力根本没有任何目的。正是上层的富人们，才是受烦恼折磨最深的牺牲品。很早前卢克莱修就对富人们的可怜样子作过描述，直到今天人们还认为他的描述蕴含着一个真理：那些厌倦于呆在家里的人，常常离开自己的大厦而到外面去，然后又转回来——原来外面的世界并不精彩。他骑着马疾驰而去，疯狂地奔往自己的别墅……就像赶去帮忙救火一样。然而他双脚一迈进门槛，就打起呵欠来，或昏昏沉沉地，寻求着把所有的事物都忘却，或者急急忙忙地再赶回城里。

这种人年轻时体力过剩且精力充沛，那不同于心灵能力的力量并不能使充沛的活力长久得以维系。但到了晚年，他们在精神上的力量就荡然无存了，也不再有想发挥这些能力的思想了，所以他们处境困窘，但却还有意志，因为这是他们惟一没有枯竭的力量。他们用容易使人激动的兴奋剂，来刺激他们的意志，诸如给靠运气取胜的游戏下大赌注，这是一种最堕落的恶习。也许有人会泛泛而论，认为一个人发觉自己无事可干，就会选择某种自己擅长的、合适的娱乐。如玩球、下棋、打猎、绘画、骑马或听音乐，打牌或写诗、研究哲学等。

这些爱好可以还原为三种基本的能力或因素。

首先是由于旺盛精力而产生的快乐，对于食物、美酒、休息和睡眠的快乐。在不同的地方，这些快乐有不同的特点和特色。其次是由于具有强健的体力而产生的快乐，如散步、跑步、跳舞、击剑、骑马及类似的休闲活动，有时这种需求采取运动的形式，有时则采取军事生活及战争的形

式。最后，是由敏感性引起的快乐，如观察、思想、感觉，或对于诗歌或文化的鉴赏力，音乐、学习、阅读、沉思、发明、哲学和诸如此类的事物。至于每种快乐的意义，相对的价值及持续的时间，可以谈论许多，但人们将会看到，所发挥的能力越杰出，它产生的快乐就越多，因为快乐总是包含着使用自己的能力，经常晃动的快乐，才能构成幸福。

在这一点上，敏感性的快乐比其他两种基本的快乐更为重要。因为这两种快乐也一样地存在于野兽中。精神的力量乃是敏感性的形式，所以敏感性的优势能使人获得与心灵相关的快乐，即所谓理智的快乐。敏感性越是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就越会获得理智的快乐。寻常之辈只对能使他的意志激动起来的事物感兴趣，即对那种让他个人高兴的事物感兴趣。不断地刺激意志不是纯粹的美事。

纸牌游戏这种“优雅社交”的一般娱乐，便是为提供这类刺激而发明出来的，而它的乐趣却是非常短促且微不足道的，因此所产生的结果倒是不尽的痛苦。

一方面，理智健全的人只对仅仅与知识相关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而不掺杂任何意志的成分，这就会把他置于一种与痛苦不能相容的境界。另一方面，精神力量极大的人则富于思想，生活充实多彩，意味无穷，一旦他自由自在地去从事这些工作，那些客观的对象就获得了价值，而且变得趣味横生，从他自身便会产生出最为惬意的快乐来。他所必需的外在激励来自于大自然的作品，产生于对人生的沉思及伟大的时代和伟大国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惟有这样的人才能欣赏到这一切，就仿佛惟有他才真正理解和感知到这些。许多人都只是为自己活着，他们向他提出呼吁，其他的人仅仅是偶然听到这个呼吁罢了，这些人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他们的追随者，都仅仅局限于一知半解。

理智的人的这种特性，意味着他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需要，他需要阅读、观察、研究，需要沉思冥想，需要实践，需要不受任何干扰的闲暇。这正如伏尔泰的评说：“没有现实的需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为什么对这样的人来说快乐是可以理解的，而其他人却拒绝接受？原因就在于对大自然、艺术、文学及其他各种各样的美好事物的需要。如果有人既不想得到这些快乐也无法欣赏这些快乐，那么即使把快乐堆积在他周围，也是完全徒劳的。人一旦超人一等，就会过着两种生活，即肉体的生活和理

智的生活，后者逐渐被看做是真正的生活，前者则被认为仅仅是达到后者的媒介。

有人把这种肤浅空虚、忧虑烦恼的生存方式当作目的。由于洞察力日益提高，知识不断增长，生活就像一件慢慢形成的艺术品那样，变得越来越连贯一致，渐渐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与理智的生活比较，斤斤计较于肉体安逸舒适和范围宽泛而实质肤浅的生活，显得非常可怜无聊。

在日常生活中，一旦没有激情来刺激，就会令人沉闷厌烦、枯燥乏味；而有了激情，生活又很快变得痛苦不堪。只有那些因自然赋予了超凡理智的人，以及除必须听从其意志命令的东西外的某些事物的人，才是幸福的。这能使他们过理智的、无痛苦而趣味横生的生活。仅仅只有闲暇自身，即只有意志的作用，而无理智，那是不够的，必须有实在的超人的力量，要免于意志的作用而求助于理智，正如塞涅卡所说：无知者的闲暇莫过于死亡。由于心灵的生活随着实在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心灵的生活能够无止境地展开。它可能只是各种昆虫、鸟禽、矿石、硬币，或诗歌与哲学的最高成就聚集起来的标记符号：心灵的生活不仅能抵御烦恼，还可以防止烦恼的有害影响。

凡人们以他们的身外之物当作生活幸福的源泉，如财产、地位、妻室儿女、朋友、社交，及诸如此类的一切；一旦失去了，或失望了，他的幸福的基础就崩溃了。他的重心并不是自己。因为各种愿望和奇怪的想法在不断地变化着，如果他是一位有资产的人，他的重心有时就会是他的乡间宅第，有时则是买马，或宴请友人，或旅行——简单地说，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这就是他从他的身外之物寻找快乐的原因。

有些人，健康和力量已经荡然无存，但他试图用果子浆和药物来恢复健康和力量，而不去开发利用自己的生命。在讨论相反情况前，我们先比较一下在两个极端之中的这一类人，这种人并没有杰出的精神能力，但理智又比一般人强一些。他对艺术的爱好仅仅限于粗浅的涉猎，或只对某个科学的分支有兴趣。如植物学或物理学、天文学、历史，并能在这种研究中找到极大的乐趣，那些导致幸福的外在推动力一旦枯竭，或不再能满足他，他就会靠这些研究来取悦于自己。这种人其重心已经部分地存在于自身之中了。但这种对艺术一知半解的爱好与创造性的活动迥然有别，对科学的业余爱好容易流于疏浅，而且不可能触及问题的实质。人不应完全

投身到这样的追求上，或让这些追求完全充满整个生活，以致对其他事物都没有兴趣。惟有最高的理智能力，即天资——无论它把生活看做是诗的主题，还是哲学的主题，它要研究所有的时代和存在，并力图表达它关于世界的独特的理解。

天才，最为急需的是无任何干扰的职业——他自己的思想和作品。他乐于孤寂，闲暇给他愉快，其他什么都是不必要的。

只有这种人，重心才可能存在于自身之中；这样的人很少，无论他们的性格如何优秀，他们都不会对朋友、家庭或一般的公众表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兴趣，而其他的人却常常这样。如果他们心里只有自己，他们就不会为失去任何东西而沮丧。这样，他们的性格就有了孤寂的基础，由于其他人不会使他们满意，这种孤寂对他们越发有效。总之，他们就像本性与别人不同的人，因为他们时刻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差别，他们就像外国人一样，习惯于流离转徙，浪迹天涯，对人类进行一般的思考，用“他们”而不用“我们”来指称人类。

我们的结论是，自然赋予他“理智财富”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主观世界和我们的关系比客观世界紧密；因为无论客观事物是什么，它只能起间接作用，而且还必须以主观的东西为媒介。

卢西安说：灵魂富有才是真正的富有，其他的财宝都可能导致毁灭。内心丰富的人不需要外在的任何东西，只需要宁静和闲暇，以发展和锻炼其理智的能力，即享受这种财富。简单地说，就是在他的一生中，每时每刻他都需要表现自己。

如果他要以这种特殊的心灵影响整个民族，那么，只有一种方式衡量他是否幸福，是否能让自己的能力臻于完美，完成他的使命，其他一切都无所谓。无论在哪个时代，最有才智的人都赋予无干扰的闲暇以无限的价值，它仿佛跟人一样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幸福由闲暇构成。苏格拉底称颂闲暇是人类所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所以，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献身于哲学是最幸福的生活。他还说：无论什么能力，只要得到自由发挥，就是幸福。这和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说的一致，既是天才又能利用自身天才的人，在利用其天赋时会得到最大的幸福。

普通人的命运注定有困扰，而它并不属于人的本性，一般人命中注定

终生要为自己和家人谋生，为求生存而与艰难相搏，所以智力活动相对较少。常常很快就会厌倦无干扰的闲暇，而不需要任何不真实不自然的目的来占有它，人生就可能成为一种负担。由于这些原因，它受到了种种可能性的威胁，有一句格言：一旦无所事事，最难的就是保持平静。

理智过于超常，就会跟变态一样不自然。如果一个人拥有超常的理智，他就是一位幸福的人，他所需要的无干扰的闲暇，正好是他的负担；一旦缺少了闲暇，他就会成为套上缰绳的柏伽索斯，就会不幸。设想外在的与内在的，无干扰的闲暇与极度的理智，碰巧在同一个人身上统一起来，就会是一种极大的幸运；如若结局一直令人满意，就会让人享有一种更高级、免于痛苦和烦恼、一种免于为生存而作痛苦斗争的人生，能够享受闲暇的人生，只需相互中和抵消，不幸就会消除。

理智过人意味着性格神经质，从而对任何形式的痛苦都会很敏感。这种天赋意味着性格狂热执著，想象更为夸张鲜明，这种想象如影随形，不可分离地伴随着超常的理智，它会使具有这种想象的人产生程度相同的强烈情感，使他们的情感无比猛烈，而寻常的人对于更轻微的情感则深受其苦。世界上产生痛苦的事情比带来快乐的事情多。理智的天资常常会使有天资的人远离其他人。因为一个人越丰富，他在其他人那里得到的就越少，别人所感兴趣的事物，在他看来肤浅而乏味。

有人常说，心灵狭隘的人实际上就是最幸福的，虽然人们并不羡慕他的幸运。索福克勒斯说：“思想乃是幸福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另一处，他又说：“没有思想的生活是最快乐的生活。”《旧约全书》的哲人们也发现他们自己面临着同样的矛盾。如《圣经外传》道：“愚昧无知的生活比死亡还可怕。”而《旧约·传道书》又说：“有多少智慧就有多少不幸，创造了知识就等于创造了痛苦。”

精神空虚贫乏的人，由于其理智狭隘偏执平庸流俗，只能称作“凡夫俗子”。我宁愿采取更为偏激的观点，用“凡夫俗子”这个词指那些为着并不真实而自以为实在的对现实忙忙碌碌的人。但这样的定义只是一种抽象模糊的界说，所以很难理解。如果我们能令人满意地提示辨别凡夫俗子的本质特征，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阐明其他的定义。

我们可以把他们界说为缺少精神需要的人。相对于他自身，他没有理智上的快乐。没有真实的需要，就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常人并非靠着获取

知识的欲望，靠着为他们自身着想的远见卓识，也不依靠那些与他们十分接近的富于真正审美乐趣的体验，来给他们的生活灌注活力。

如果上层社会欢迎这种快乐，这些凡夫俗子就会趋之若鹜，他强迫自己这样做，但他们所发现的兴趣只局限于在尽可能少的程度。他们惟一真正的快乐是感官的快乐，他们认为只有感官的快乐才能弥补其他方面的损失。在他们看来，牡蛎和香槟酒就是生活的最高享受品。他们的生活就是为了获取能给他们带来物质福利的东西。他们确实会为此感到幸福，尽管这会引起他们的一些苦恼。就算他们沉浸在奢侈豪华的生活中，他们也感到烦恼。为了解除烦恼，他们使用大量的迷幻药物，玩球、看戏、跳舞、打牌、赌博、赛马、玩女人、饮酒作乐、旅行等等。而其实，这些都不能免除烦恼，因为哪里没有理智的需要，哪里就不可能有理智的快乐。

凡夫俗子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呆滞愚笨、麻木不仁，与牲畜相似。任何东西也不能使他高兴、激动或感兴趣，一旦那种感官的快乐衰竭，他们的社会交往就会成为负担，这样，就会有人厌倦打牌了。他们无法舍弃那些浮华虚荣的快乐，他可以通过这些虚荣来享受到自己实实在在的快乐，如，他感受到自己在财产、地位相对于其他那些敬重他的人的权势及力量，都高人一等，或去追随那些富有而且具有权势的人，依靠他们的光辉来荣耀自己。从凡人的本性看，由于没有理智的需要，只有物质的需求，他也会与那些能够满足他的物质需要的人进行交往。他把别人给他的理智能力看做是无关紧要的；即使他碰巧遇上别人拥有这种能力，也会引起他们的反感甚至憎恶。

由于除了令人不快的自卑感外，在他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一种愚蠢的妒意，他不得不把这种妒意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而这种妒忌却可能变成一种藏而不露的积怨。尽管如此，他也不会想到使自己的价值或财富观念符合这样一些性质的标准。他不断地追求地位、财富、力量和权势，在他眼里，只有这些东西才是世界上真正一本万利的，他志在使自己擅长于谋取这些福利，这就是一个没有理智需要的人的结局。

对理想丝毫没有兴趣，这是庸人最大的苦恼，而且为免于苦恼，他们不断地需要实在的东西；而实在的东西既不能使人知足，也很危险。当他们对这些失去兴趣时，他们就会疲惫不堪。相反，理想的世界是广阔无边的、平静如水的。

金钱与人

伊壁鸠鲁把人的需要分为三类：一是自然必需的需要，当这种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时，便导致痛苦。二是自然的但并非必需的需要，如某些感官的满足。这些需要难以得到满足。三是既非自然又非必需的需要，它们是阔绰豪华、奢侈挥霍的需要，即身居高位、光宗耀祖的需要，这种需要永无止境，要满足这种需要难上加难。

一个人的财富数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财富的数量只是相对的，即正好维持在一个人想得到和他所得到的两者之间的比率上。因为衡量一个人的幸福，只根据他所有的而不根据他所期望得到的东西来衡量，就像只有分子而无分母的分式。对我们来说，绝不会有任何东西能引起我们的需求，而让我们感到它们的存在。没有它们，我们照样幸福，如果我们想得到某件东西而不能得到，其他的东西即使多出几百倍来也会让我们满足。事实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水准，而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得到尽可能多的东西。我们有信心在这一水准内得到它便会幸福，反之就会痛苦。在这一水准外的东西，

对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富人们的万贯家财并不会使穷人激动不安。相反，腰缠万贯的人，其希望的破灭并不能因财富领先而告慰自己。有人说，财富如海水，越喝越渴。原因就是——一旦命中注定不拥有财富，人们就会降低自己所要求的数量。一旦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要降低我们的要求就很痛苦。如若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不幸，痛苦就会越来越少，甚至不再存在，这就像已愈合了的旧伤口。相反，一旦吉星高照，我们的口味就会越来越高。但这种感觉膨胀的过程一结束，快活的心情也就烟消云散，两者相辅相成。我们习惯于追求越来越多的欲望，因而对于能达到这些需求的财产也会不以为然。《奥德赛》中有一段话揭示了这一真理：人们静思尘世的思想，如同人神之父所给予的白昼。当我们的财富不能满足各种欲望时，就会因不断地努力增加财富而倍受折磨。

人类还有很多的需求，人类赖以生存的整个基础都是需求，我们想到这些，财富赢得最纯真的敬意与极大的荣耀就不足为怪了。只有赢利才能使生活变得更好，而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所有事情都可以放在一边。人们常常因为欲望钱财甚于其他，并且嗜财如命而受到谴责。人往往喜欢那些变幻无穷的东西，即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什么欲望就要实现它。任何别的事物都只能满足一个愿望、一种需要，如食物，只有在饥饿时才是美好的；生病时需要药物，皮裘能抵御冬天的严寒，爱情能满足年轻人的情感；等等，都只是“相对的好”。由于钱不仅能满足我们对某一特殊事物的具体需要，还能满足人们其他的需要。倘使某人有幸不受饥寒之苦，能够过上悠闲自在的生活，他就会把钱当做一座防御可能会遭遇的多种痛苦和不幸的堡垒。他不会认为，为了获取人生的快乐便可以恣情纵乐，或以某种方式毫无目的地浪费钱财。

生来没有这一殊荣的人，由于尽情地发挥了他们所有的才干，结果成为巨富，这样的人常常会把天赋看做自己的资本，而他们所获得的钱财则仅仅是这一资本所生的利息。如若他们只赢得了永久性资本的部分收入，他们就绝不会罢休。但一旦他们金玉满堂，他们就会大肆铺张。

所以，他们又常常陷入贫困。他们的收入不断减少，到最后消耗一空，他们的才能已消失殆尽——在优秀的艺术家那里就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他们的才能只是在当时的一系列特殊环境里才能产生效益。一旦环境改变，他们的才能便不再奏效。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吃饭的人几乎

都是这样对待他们的财富的，因为他们的技术不会丢失，即使丢失了，他们工友的技术还会替代，而且永远会有人从事他们的工作。

艺术家和专家情况多少有些一样，这就是他们报酬优厚的原因，他们应当以他们的收益作为资本，但他们却不顾后果地把这些收益看做利润，结果却是倾家荡产。另一方面，那些继承了钱财的人至少也会知道如何区分资本和利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努力保住他们的资本，并使之不受损失。如果他们有能力，他们至少应该把利息的 12% 存起来以备未来的紧急情况，这样他们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但资本和利息并不适用于商业生活。对商人来说，钱只是获取更多利益的媒介，就像工人手中的工具，即使他们手中的资本完全达到了他们努力的目的，他们也还会用它来保存这笔财产并使资本增值。

一般来说，真正知道需要什么和缺乏什么的人，比起那些通过道听途说了解贫困的人，更不会为需求而担忧，因而就更容易奢侈浪费。在优越环境里成长的人，对将来比那些靠运气突然摆脱困境的暴发户要慎重认真得多，在生活上要节俭得多。如果贫穷离我们很远，贫穷倒仿佛并不是一件真正令人痛苦的事情了。但是，生而富有的人把财富看做是没有它便无法生存的东西，就像没有空气就不能生存一样。所以，他喜欢有条不紊地正常生活，喜欢深思远虑勤俭节约的生活。生而贫困的人则会把贫穷看得十分自然，倘使侥幸发了横财，他就会认为过分多余了，要把它奢侈浪费掉，即使最后两手空空，他仍然不过和从前一样，而且忧虑更少。

有一句格言：骑马的乞丐会让他们的坐骑忙于奔命。

据说，这种人对已使他们摆脱贫困满足需求的命运和某种特殊的手段，怀有坚定执著的希望；他们和天生富有的人一样，不会把少许贫困看得深不可测。他们认为，即使已完全失败，也还会重振旗鼓。

人类的这一特点解释了这个事实，贫家女在婚后比那些给丈夫带来丰厚嫁妆的女子贪心更大，而且更奢侈铺张。因为一般来说，大家闺秀不仅比贫家女带来了更多的财产，还带来了更多的热望和遗传的天性，以保护其财产。如果谁怀疑这个真理，认为情况正好相反，他就可以从阿里奥斯托的第一篇讽刺诗里得到验证。

约翰逊博士的观点和我完全一致。他说：“有财产的妇女，善于管理钱财，并且她会极其明智审慎地使用这笔财产。而从婚礼一开始就牢牢地

控制了钱财的女人，则花钱如流水，穷奢极欲，把钱财花光。”我奉劝娶穷小姐为妻的先生们，不要将资产而只能将利息留给她们，而且千万不要让她们去掌管孩子们的财产。

这里我并不是在漫谈某些不值一提的话题。因为一步入生活，就需要有足够的资产，使我们能独立起来，不必工作就可以过上舒适的生活。虽然对此不宜评价过高，却是一大优势，因为这使得我们不受饥寒交迫之苦，而穷困潦倒就像瘟疫一样在人们生活的周围盘旋着，被迫的劳作是自然给以凡夫俗子们的命运，而资财却能从艰难的劳作中解脱出来。只有这样，有命运相助，才能说某人是自由的。即能够支配自己的时间和能力，才能在每天早晨说“今天属于我自己”。正是由于同样的道理，年进款 10000 元与 100000 元的人的差别，和年收入 10000 元与一无所有的人的差别比较起来，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但一旦继承的资财花在具有极高精神力量的人手中，就会创造出巨大的价值，他可以执意去追求为谋取钱财之外的不同的生活，命运给予他双倍的酬劳，他的天赋就是他生活的目的。而他以百倍的价值来回报人类，他就会取得别人无法取得的成就，他会创造某些作品，使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受益无穷，而且可以提高整个人性的尊严。

有些人可能用自己的财产去从事慈善事业，使自己赢得大家的崇高敬意。那些没有这样做的人和不想这样做的人，及从来不想了解某些知识的基本原理以便提高知识水平的人，尽管是生在富贵之家，也仅仅是一个虚度光阴、懒惰卑劣、无耻下流的家伙。他不会幸福，因为对他来说，需求已得到了满足。他会遭受其他极端的痛苦，如果他因为贫困而有事可干，情况倒会更好一些。一旦遇到苦恼，他就容易去挥霍浪费，与之不配的优越之处就会失去。很多人发现自己有着无尽的需求，其原因在于他们有钱时，只是为了从折磨他们的烦恼中得到片刻的解脱，靠花钱解忧。

如果有人志在取得政治上的成功，那就是两码事了。在政治生涯中，重要的是获得他们的朋友及党派团体的好感，以便依靠他们的帮助，加官晋爵，平步青云。如果这位胸怀宏愿的人并非来自门庭显赫之家，而仅仅是一位有天赋的人，那么穷困潦倒就会促使他发挥自己的优势。因为无论是谁，平常和人相处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证明自己胜人一筹，在政治生活中尤其如此。因此，只有彻底的寒门之子，才会自感在所有方面都低人